

19 世紀中期以後國際銀價變化和海關稅收價值的增減問題

朱螢俊先生（首爾大學校東洋史學科博士生）

我的研究主題是關於近代中國的關稅徵收和管理的問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 19 世紀後期開始因匯率急劇變動帶來的關稅的增減，以及由此所引發的財政、經濟結構的變化。發表的主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 「匯率變動」及「海關稅收」問題

我提出了 19 世紀中期以後國際銀價變化和海關稅收價值的增減問題。以 1903 年的匯率下跌、1915 年的匯率下跌、1920 年匯率上升為背景，在財政和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由於時間的關係，我的發表以匯率上升為背景，在 1930 年實施的海關金單位制度上，將對南京國民政府的金本位制度的引入進行說明。

□海關銀號的代理徵收和保管權問題

令人特別關注的時期，則是鴉片戰爭以後出現的海關銀號逐漸擴大了。壟斷徵收關稅和保管權限的海關銀號的出現，成為了掌握這一傳統的金融機構錢莊快速成長的背景。然而這樣的代理徵收體系卻面臨破產的風險，此處將以海關銀號破產的案例來觀察徵收結構的變化。我認為在此無須花費太多時間討論海關銀號的相關內容，應該將重點集中在內容

□的部份。以下即是大略的

<1> 匯率變動及海關稅收的價值增減的問題

隨著 19 世紀末國際金本位制成立，海關稅收受到了匯率變動的影

響。國際銀價下跌威脅到外債和賠償金的穩定性，進而導致了內債價格的下跌。

20年代的國際銀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直線下降，對財政和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子文在即將迎來北伐的勝利之際，即1928年6月和7月召開全國經濟會議和全國財政會議，樹立了今後中國的財政和經濟計劃。在這裏決定的幣制改革事項之一就是離脫銀本位制和引入金本位制。為此實行廢兩改元，並決定實行銀本位制統一以後的金本位制。但是，甘末爾在1928年提出了反對計劃，他提出了省略廢兩改元的方案，起初宋子文雖拒絕了這一提議，但最終還是接受了甘末爾的提案。

他的改革方式是以地區為單位逐步擴大金本位制，並在完成改革之前，在過渡期內引入金本位制，防止匯率損失。於是他在1930年2月實行了海關金單位制度，以及在1931年以廣東省為始，決定引入金本位制。到目前為止，1928年的計劃已被修改成了「省略廢兩改元」及「立即進行金本位制」的制度。此後由於種種條件的變化(特別是國際金本位制度的崩壞)，已沒有意義引入金本位制，進而轉向實施廢兩改元的方向。總而言之，我想用「1928年全國經濟會議、全國財政會議 - 1930年海關金單位制度實施(金本位制之嘗試及挫折) - 1933年廢兩改元 - 1935年法幣改革」以上模式說明南京國民政府的改革史。

<2> 海關銀號的代理徵收和保管權問題

最近我關注的部分是在價格上升的情況下，中國的匯率下跌。如果國際銀價下跌，中國需要支付的外債和賠償金額會增加，因此有可能會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但如果相反的話，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關

於這個部分的說明似乎並不多。實際上 1903 年至 1907 年間國際銀價約急速上升了 30% 以上，我特別關注關稅的增加。雖然簡單地說，關稅的增加意味着國家稅入的增加，但從當時關稅徵收體系來看，關稅沒有立即移交到國庫(確切的說是部庫)，而是由民間代理徵收機構海關銀號保管。因此有必要關注擁有海關稅收和保管相關權利的海關銀號。

鴉片戰爭以後廣東 13 行徵收的海關稅收和保管任務轉移到了海關銀號。這無疑是巨大的利益事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紅頂商人胡雪巖經營的阜康銀號。胡雪巖在左宗棠的庇護下，獨佔了浙海關、閩海關、廈門關、江海關的海關銀號運作，進而成為中國首富(省略)。這樣的徵收體系在外國人總稅務司制度成立後也沒有太大的變化。在發生辛亥革命之前，海關監管管理下由海關銀號執行這些任務。

問題在於海關銀號的破產。海關銀號的破產導致了海關稅收的損失，亦導致了財政上的嚴重問題。由於海關銀號的不穩定性，海關銀號可以運用的海關稅收範圍有所限制。此外，由於破產的風險，部分地區甚至出現了海關監督直接經營的情況。

有趣的是，清朝和列強開始關注這些海關銀號的利益。事例(1) 清朝向上海的海關銀號徵收利息。(2) 清朝在銀行的創立和"國庫統一章程"、"盛宣懷"的中國通商銀行設立過程中，對關稅的重視程度非常明顯。(3) 在總理衙門檔案中，日俄戰爭爆發後，圍繞着營口的海關稅收和保管權，存在着清朝和日本之間的矛盾資料(03-19-004-05 系列)。日本以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東三省事宜條約)第 4 條為依據，在戶部銀行設立營口分行之前，要求日本正金銀行負責關稅保管。這一事件意味着海關稅收保管權問題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經開始成為爭論焦

點。在海關稅收保管權的轉移背景是匯率波動產生了影響。(省略)

Religions in 18th century Inner-Asia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he Manchu Empire: A Study of Temples in Nine Cities of Ili

(十八世紀滿洲治下中亞宗教狀況：伊犁九城廟宇考)

孔德維先生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The Manchu conquest of Inner Asia marked a shift in world history. With material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a military alliance with the Mongol tribes, the Manchu Empire pushed its territory to central Eurasia. It was traditionally understood that the Qing Empire intended to separate Han, Mongol, and 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Western frontier. As Jonathan Lipman and James Millward would suggest, the ethnic policies of the Qing Empire in Altishahr and Zungharia (later Xinjiang), were aimed at discouraging interaction, collaboration and syncretism between “Chinese” and “non-Chinese” peoples, as in inner-frontier zones like Gansu and Yunnan,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However, as noted from the ethnographies and cartographies of the region made since the 1760s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emples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Tibetan Buddhism were constructed by Manchurian, Mongolian and Han colonists and immigrants. The builders and worshippers included officials, militants, and merchants from other regions of the Qing Empire. These temples were built in the 1760s, neighbouring several mosques attended by local Muslim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in the Ili 伊犁 area. Ili was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the Qing Empire since the mid-18th century, and was a region populated mostly by Muslims, whereas the military forces stationed there were mainly Manchurians, Mongolians and Han Chinese who followed different religions than the native population. Consequently, the governance of the newly conquered area for the Qing Empire was not without difficulties.

Beginning in the 1760s, newcomers to the area constructed temples, including a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Chinese City God temples, an Emperor Guan Temple and others in the nine fortified towns.

How these temples were constructed and worshipped in merits detailed scrutiny. Whether they served the religious needs of the foreign population staying in the region only, or they aimed also at spreading the Qing Empire's religions to newly dominated Muslim populations, mark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This research examines ethnographies and cartographies produced from 1760 to 1840,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mples in the region.

刻經・念佛・扶鸞： 晚清揚州修淨人士的宗教活動

徐郁縈女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本研究之目標係深入探討晚清揚州佛教徒修持淨土法門的群體活動，包括相關信仰與實踐（如刻經、持齋念佛、扶鸞等），以及女性信徒所扮演之腳色。研究分析是以鄭學川（1826-1880）為首，進一步瞭解這些佛教徒之修行模式。鄭學川，字書海，同治五年（1866）出家，法號妙空，著書有《樓閣叢書》四十八卷（咸豐九年（1859）刻印），內容收有鄭氏的佛教思想及詩詞創作。太平天國以後，鄭學川與居士楊仁山（1837-1911）、許靈虛（1830-1895）等人，發願倡導刻經，首創「金陵刻經處」，並在揚州的東土雞園成立「江北刻經處」，此處也是當時較為重要的淨土蓮社之一。就《修西聞見錄》（光緒三年（1877）刻印）的紀錄，修淨比丘、比丘尼、居士、善女人、童女以東土雞園接引道院為主要據點，進行捐資刻經、持齋念佛、水陸懺儀，甚至也出現過去研究尚未留意的扶鸞活動。本研究將就相關史料，首先梳理鄭學川的宗教交往網絡，論析其佛教思想對揚、泰兩州修淨人士的影響，並特別關注女性信眾的參與成分，同時探討修持淨土法門的居士扶鸞問事的體驗經過。

關鍵詞：晚清佛教、揚州、鄭學川、江北刻經處、淨土法門、《修西聞見錄》。

章太炎的佛教思想與實踐： 兼及晚清士人精英的政教理念

呂雨辰先生（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博士候選人）

本論以活躍於晚清民初的反滿革命家、國學大師、民國重要締造者章太炎（1869-1936）為研究對象，力圖展現、分析他的生平與思想中較少為人關注的一面，即他的佛教信仰世界。研究擬跳出人物傳記、佛教思想史的舊框架，以晚清這個大轉型時代中士人精英群體的政教理念為主要的問題意識和脈絡語境。

本論在研究中注重完整性和貫通性。迄今為止，對於章氏佛教思想的內容和旨趣已經多有研究，但是大多忽視了一前一後的兩個時期。一則在因言入獄三年（1903-1906）之前，章太炎的佛教信仰的諸多因素已經逐漸具備，出獄東渡日本後章氏以宗教與國粹並舉來贊助革命，淵源有自。二則在進入民國之後，表面上看章太炎的佛教熱忱逐步消退，並最終回歸到了尊孔讀經的純儒的舊角色。但事實上，章氏把佛教作為形而上真諦的信奉，是終其一生的；改變的是他對於佛教在政教關係中的定位，或者說，在劇變的時勢下，他放棄了佛教的世俗之用。

本論另一個方法論上的努力，是把文本細讀放回到脈絡語境

中、放回到章太炎本人的問題意識與道德精神中。這是針對前人在闡釋章氏核心文本時，普遍存在的“均質化”的缺陷，即把章氏的佛教思想當作前後一致、可以從他的人生歷程和社交場域中抽離出來加以概括的東西。另一個需要修正和克服的則是以粗線條的革命史觀籠罩具體研究，把章氏的佛教思想片面地看作為反滿革命服務的工具，忽略了兩者之間深刻的矛盾；這在章氏 1907 年構想“五無之境”前後尤其顯著，事關不易察驗的重大問題。

雖然注重完整性，但是本論在組織結構上沒有單純以時間為線，而是把歷時邏輯和專題式研究相結合，大部分章節都有一個聚焦的主題和明晰的問題意識。本研究的創新成果至少有以下三條：一、揭示了章太炎多樣而長期的宗教實踐與經驗，包括禪修、多次出家的衝動、對印度的嚮往及相關活動、入地獄判案的異夢等，就此可以糾正認為章氏好佛學而不學佛的普遍成見。二、指出宰制晚清思想界的進化論是章太炎重塑其世界觀和道德秩序的努力的首要對手，把章氏出入荀學、以國粹反滿、揚棄無政府主義以至佛化的五無之境、轉向齊物哲學從而克服了目的論世界觀，這些分佈在各章的主題有機地貫通起來，從而讓章氏佛學的變和不變的兩面更可理解。三、在前人已多闡發的“求是”與“致用”間的抉擇之外，另辟“獨”與“群”的二元概念來把握章太炎的生存處境和思想性格，從他早年的《獨居記》

直至他晚年對“儒行”的倡導，作為對整部博論的總結。獨與群的微妙的兩難關係，既說明了佛教何以在民國以後逐步退入章氏的私人領域，也有助於我們理解佛學何以能始終佔據他內心世界的高地。